

兩漢時代《春秋左氏傳》立學官之曲折

黃 翠 芬

【本文提要】

漢代立於學官之經書，得以藉由政治力量而盛行於學術界。《春秋》三傳中，《公羊》、《穀梁》皆興立於學官，唯《左氏傳》頻遭阻絕，旋立旋廢。劉歆倡之在前，韓歆、陳元力爭於後，盧植再為請命，終未能確立，其間原由實須縷析釐清。本文首明學官概況及專經博士之職掌；繼而推究《左傳》舊籍之來歷；再探討劉歆屢為《左氏》爭取立於學官，而不時出現與今文官學對立抗衡之窘況；又韓歆、陳元再議，分別與范升往復辯難，雖得力挽狂瀾，使《左傳》再立於學官，但又岌岌可危，旋令廢棄。綜理其終漢之世未得建置之癥結，分別就：未能暴論讖諱大義、未能迎合上位者政治需求、古文晚出備受排擠、學官經學繁瑣日漸衰頹、官學沒落私學興盛、今古經學之融合等方面加以推敲擲陳。《左傳》議立學官之過程，雖辯論紛陳，曲折多磨，反覆不定，卻反而促使時人對《左傳》認識愈明，體察愈深；終漢之世，《左傳》雖未能穩立於學官，卻反得以自由之身，不受官學束縛，不斷開展，日益顯發，遂得以執三傳之牛耳。

壹、前言

中國經學昌明於漢武，盛行於東漢。漢代對於說經之書為其置博士、立學官，藉政治力量，使該學術高居權威地位；更為經師、經生開闢仕途。故某一經得立於學官，變私學為國學，大有助於該經學之盛行於學術界。

《春秋》三傳中，《公羊》、《穀梁》是發揮微言大義；《左傳》則以史實解經。武帝時《公羊》立於學官，宣帝時《穀梁》繼立。而《左氏傳》則遲至平帝時，王莽主政，始得立於學官。但並非從此時即步上坦途，光武中興，盡廢王莽所制，《左傳》即在廢除之列。光武雖曾一度再立《左傳》，卻又旋遭阻絕，此後終漢之世不見再立。其間旋立旋廢，過程坎坷，頗見曲折，實值得深入辨明。

貳、學官與經學博士

一、經學興盛

《史記·儒林列傳》載及漢興經學日受重視之概況：

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六藝從此缺焉。……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孝惠、呂后時，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武帝）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①

高祖馬上得天下，不喜《詩》、《書》^②。惠帝雖廣開獻書之路，但所在皆武力有功之臣。文帝時頗有進用儒者，但好刑名之言。景帝則不任儒者，儒者一直未受重用。直到武帝即位，大力延攬儒者，罷絀百家，獨尊儒術，將兩千年來之儒學定於一尊。

漢武帝時，《詩》、《書》、《禮》、《易》、《春秋》始稱「五經」，推尊孔子，以孔子手訂之書名之曰「經」。又因去聖日遠，經書微言奧旨幽深難明，於是又有「傳」^③。「傳」乃解釋聖人經典而作，蓋門人後學追記微言，依經辨理，垂昭後世。故以「傳」為「經」之遺緒，一如《三傳》逐漸得與《春秋經》並尊，各形成一家之學。

《漢書·儒林傳·贊》云：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從武帝開始為五經立專經博士，如此以利祿誘導，於是習經成為士人仕進之途，人人誦習，家家讀經，自帝王至崖穴之士，莫不以倡導儒術，講明經學為職志；天下士人，亦莫不以習經為進身之階，《漢書·韋賢傳》鄭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

① 《史記》卷一二一，頁二、三。

② 詳見《史記·陸賈列傳》。

③ 劉知幾《史通·六通論》釋「傳」曰：「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後人。」

可見當時看重經學如此。而武帝大力獎勵，更是漢代經學昌明之關鍵。

二、專經博士

博士為經學主導者，領政府俸祿，傳承一種經書。博士官之設立，根據《漢書·百官公卿表》所載：「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是博士乃秦已制定之官位，掌通古今，為太常屬官。而太常掌「宗廟禮儀」，可見當時博士並無政治實務，只是隨從備問，此從《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約略可見博士官之職掌：

（二十六年）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

（二十八年）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

（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丞相李斯曰：「……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

（三十五年）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

（三十六年）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調弦之。

（三十七年）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

可見通古今之博士，除用備顧問外，亦足以議國政、代作詩，及掌詩書百家語之典藏，其職掌無一定，殊為龐雜。漢雖承襲秦博士之制，武帝時卻有所變革，博士之設成為專經博士。

專經博士之設立，文景之世雖有《詩》、《書》、《春秋》博士之設，皆屬顧問。逮武帝立五經博士，《漢書·百官公卿表》曰：「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元年稍增員十二人。」專經博士自武帝開始設立，此後經學日益興盛，學說派別也愈分愈多，至宣帝博士，增至十二人，此後又稍有增設。此從《漢書·儒林傳·贊》所載，可見前漢諸經博士分立之情形：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

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④宣帝時所增置之博士^⑤，根據王國維〈漢魏博士考〉以為「宣帝末所有博士，《易》則施、孟、梁丘，《書》則歐陽、大小夏侯，《詩》則齊、魯、韓，《禮》則后氏，《春秋》公羊、穀梁，適得十二人。」^⑥

直至光武中興，恢復五經博士制，凡立十四博士，《後漢書·儒林列傳上》詳曰：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⑦

以上乃兩漢之世立五經博士之概況。^⑧

蓋自武帝之後，宣元以來，儒術日盛，朝廷博士遂多增設，當此之時專經博士，其職掌與性質已大不似秦。從此博士一職，從通古今方伎之雜流搖身而成為「經師」，提升成為官方之學術地位。一經一人，經學博士具備政治之法定地位，專門職掌其所代表之經典，對於其職掌之經典有解釋之法定權威，並以教授經學為固定職責。^⑨

三、學官

所謂「學官」，即是學舍。《漢書·文翁傳》載曰：「（文翁）景帝末為蜀郡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是學官之立，早見於景帝之時。元朔五年，武帝從公孫弘之議，博士置弟子員（《史記·儒林列傳》、《漢書·儒林傳》，載公孫弘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並從董仲舒之議地方設學校（立學官），〈董仲舒傳〉云：「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並以政府核定之員額招收弟子。

武帝時，博士弟子列為仕途正式之出身，為政府部門儲備人才，每年考試，能通一藝以上者，可補文學掌故缺；學優者，可任郎中以上之官職。（《史記·儒林列傳》）「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此

④ 《漢書》卷八八，頁二五。

⑤ 宣帝時增置之博士，見於《漢書·宣帝紀》甘露三年、〈藝文志〉、〈劉歆傳〉、〈百官公卿表序〉，以及《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四年詔，但所載互異。

⑥ 見《觀堂集林》卷四，頁一八四，世界書局本。

⑦ 《後漢書》卷七九，頁一，王先謙《集解》，藝文印書館本。

⑧ 關於博士家數及員額更動，可參王國維〈漢魏博士考〉、錢穆〈兩漢博士家法考〉。

⑨ 詳徐復觀《中國經學史之基礎》，頁七五～八〇。

後，博士弟子員人數日益擴大，《漢書·儒林傳》載曰：

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倍增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縣設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

武帝時是五十人，昭帝時增至百人，宣帝又倍增之，元帝時通一經者免賦役，後定為千人，成帝末則一度增至三千人，旋又復故。學官成為朝廷人才之養成機構，專經博士亦成為人才養成機構之領導。弟子員可透過一定管道取得官位，從員額不斷擴編，員額限制外又有所增加，學官日益擴大，儒生便逐漸在政治舞臺上集體成就政治實力，專經博士自然躍身為政壇顯要。

因此，得立於學官者，設博士、置弟子，高居學術之權威地位，開闢士人利祿之門，通經成為讀書人獲取利祿之徑，自是天下靡然從風，學者益眾，學說自是備受肯定。此藉諸政治力量，保障學術，刺激經學加速發展；相形之，不得立於學官者，僅得私相傳授，較難以迅速取得學術地位及受到重視。

參、《左氏傳》舊籍復出及《經》《傳》創通

《春秋》一經，極不易解，於是後學為之作「傳」，據《漢書·藝文志》所載：

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由此可見，解說《春秋經》之「傳」，除「明夫子不以空言立說」之《左傳》外，其他「末世口說流行」凡四家：其中鄒氏、夾氏以無師、無書不傳，《公羊》和《穀梁》則備受重視得以立於學官；而真正以事實解經之《左氏傳》，反不見重於時，不立於學官。

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⑩」（《漢書·楚元王傳》），漢代秦而有天下，廢挾書禁律，鼓勵民間獻書，《漢書·藝文志》曰：

^⑩ 以古事為是者即罪之。

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

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

自秦之焚絕典籍，至惠帝除挾書之禁，其間歷二十餘年。經楚漢爭戰之摧毀，隱而不宣之《左傳》，始得以在「廣開獻書」之時代重見天日。

一、北平侯張蒼獻古文《春秋左氏傳》

先秦經籍得以劫後餘存者實非容易，對於《左氏》之復出，後人多究其來路，清阮元《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序》云：

《春秋左氏傳》，漢初未審獻於何時。漢《藝文志》說孔壁事，祇云「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不言《左氏經傳》也。《景十三王傳》亦但云「得古文經傳」，所謂傳者，即《禮》之《記》及《論語》，亦未言有《左氏》也。《楚元王傳》劉歆讓太常博士，亦以《逸禮》三十有九、《書》十六篇系之魯恭王所得，孔安國所獻；而於《春秋左氏》所修二十餘通，則但云「藏於祕府」，不言獻自何人。惟《說文解字·序》分別言之曰「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然後《左氏經傳》所自出，始大白於世。

根據東漢許慎所言，《春秋左氏》經、傳原本各自單行，《春秋經》得自於孔壁，《左氏傳》則北平侯張蒼所獻。如此一來，《春秋左氏傳》不但由北平侯張蒼所獻，藏諸祕府；而且亦由張蒼所傳，流傳民間。《漢書·儒林傳》曰：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為蕩陰令，授清河張禹長子。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為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為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由此可見，兩漢《左氏》學始於張蒼，因賈誼作《左氏傳訓故》，故後來傳承皆自賈誼出，至賈護、劉歆從而大之；賈護、劉歆之後，言《左氏傳》者皆以賈、劉二人為師法；又以劉歆能創通大義，故影響遠在賈護之上。

二、劉歆引《傳》解《經》確立經學地位

在劉歆之前，學者對於《左氏傳》僅是傳訓詁，尚未使經傳相互發明。《漢書·楚元王傳》云：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

西漢後期經學家劉歆，《漢書》載其出身名門，從漢初楚元王開始，六傳至劉歆，其祖輩或為王侯，或為大夫，多居要位，累世顯赫。因此，自幼飽讀《詩》、《書》。成帝時與父（劉向）受詔領校祕書，無意中發現《左傳》古本，喜出望外。尋師訪友之後，為《左傳》注入新成分。

蓋漢初流傳之《左氏傳》多古字古言，至「（賈）誼為《左氏傳》訓故」，後來之學者亦僅「傳訓故而已」；對於其解說《春秋經》之功、為《春秋經》作傳之地位，並未加以重視。迨劉歆於祕府校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想像劉歆初見古文《左氏傳》之情狀，必是如獲至寶；而其「大好之」之緣由，當不僅為《左氏傳》之詞采筆力所感動，相信必更贊嘆其解經傳經之功。故而，旋即與能治《左氏傳》之丞相尹咸共校《經》、《傳》；進而從尹咸、翟方進「質問大義」，以此可見劉歆對《左傳》之熱中執著。^⑪

原本《左傳》與《春秋經》是相對獨立之書，直至劉歆始將此二書作內在聯繫。如此使《左氏傳》不僅止於訓故，更具備解《經》之功，通過劉歆「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對於劉歆此番作為，後人常不解其義，憑生疑測，甚至以為《左氏》傳《經》成分乃劉歆偽造附益所致^⑫。殊未知劉歆「引《傳》文以解《經》」

⑪ 劉師正浩之說，詳見田博元等編《國學導讀》（二）〈左傳導讀〉，三民書局本。

⑫ 「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清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引此處，而以為此即是「今本《左氏》書法及比年依《經》，節《左》緣《左》，均歆附益之明證。」其他如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崔適《史記探原》、顧頡剛《古史辨》等均有此看法。

之舉，乃為《左氏傳》確立解《經》之地位^④。

從此《左傳》搖身一變，被納入「經學」範疇，並從訓故之學轉為義理之學，不但受推薦被重視，繼而爭立學官、角逐認可，儼然成為古文經學之一大支柱。

肆、《左氏傳》首度議立學官

立學官者，乃經書一家之說受帝王冊定。西漢經學博士皆今文家，古文並未立於學官，僅於民間學者相互傳授。直至劉歆不憚煩難、竭智盡慮爭取《左氏》立於學官。

一、劉歆首先爭取立《左氏傳》於學官

《左氏傳》舊籍復出，然並未能立於學官，雖流傳民間，學終未顯。初，成帝時，劉歆領校祕書，時發現多本古文經（《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尤其「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哀帝時，大司馬王莽舉歆為侍中太中大夫，後復領五經，卒父前業。建平元年，劉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由於劉歆系丞相，因此所上奏章，多為皇帝所採納。

此一有機會便推舉《左氏》於學官。

劉歆建議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等古文經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今文博士講論，由於學說彼此歧異，今文諸儒博士既不肯立《左氏》等古文於學官，又不肯與歆論議相對，於是歆移書太常博士而責讓之，引發一場激烈鬥爭。

《漢書·楚元王傳》詳載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之文。劉歆對所推舉之古文經學曰：「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可見所欲議立者，皆有憑有據；皇上亦已審視過，並非無端妄舉。然而今文博士卻「深閉固距」，「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指責古文經變亂師法。劉歆則指責今文官學「信口說而背傳記」，以致於國家大事中，「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指陳今文官學有所蔽見，不思廣識；反而私心自用，抱殘守缺。

在爭論激烈中，哀帝嘗「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足見「閔文學錯亂」有意「繼統揚業」之哀帝，在此特重《左氏傳》，詔問博士，是否應先立《左氏》？希望藉由論辯，使經藝之廢遺，有興立之機。歆以為諸博士，實不宜再「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由於立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當劉歆遭諸博士羣起攻訐時，幸賴哀帝解圍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為非毀哉？」由於忤逆執政大臣，歆頓時成為眾矢之的，恐遭殺身之禍，因而急求出任太守以避禍。

當時今文博士以《左氏》不傳《春秋》為由，極力排拒。由於反對聲浪巨大，終哀帝之世，劉歆所議立之古文經學皆未見許。然爭戰並未因此而止息，此後不斷漫延，揭開接二連三今古文之爭^④，爭執關鍵除學術之對立，當然更在於利祿之攘取。

二、劉歆再議請立《左氏傳》於學官

哀、平之際，政權出現危機，政治鬥爭尤其激烈。對於一向壟斷經學之今文官學，此時必須面對古文經學日益凝聚之對抗勢力。

哀帝駕崩，平帝即位，王莽專政，劉歆再度挑起今古文之爭，尤以《左傳》與專講

^④可詳林啟彥編著《中國學術思想史》，頁九一～九二，言今古文四次之爭：第一次是劉歆與太常博士之爭，第二次是韓歆、陳元與范升之爭，第三次是賈逵與李育之爭，第四次是鄭玄與何休之爭。

典章制度之《周官》作為古文經學之主要經典，而其所述周公居攝稱王之史實與周公所制典章制度，此時正合王莽所需。在復古改制中，王莽無法從今文經學得到依據，反而從古文經說獲益良多。此外，為奪權鬥爭之需，王莽也有意援古文經學之勢力制衡原有之今文經勢力。

再者，由於王莽「少與歆俱為黃門郎」，嘗受《左氏》之學，（《漢書·楚元王傳》）可見王莽習識《左氏》，素與歆友善，王莽專政時，「莽以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漢書·王莽傳》）。故對於歆請立《左氏學》，必能大力支持。於是古文經學此時便依傍政治力量得到扶植。除保留原有之今文博士，《周官》及劉歆先前所倡儀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等古文經學皆被立於學官。迨王莽篡位，劉歆成為王莽之國師，更成為藉政權推展古文經學之核心人物。^⑮

王莽覆敗，今文派勢力大振，力圖恢復昔日獨占官學之優勢，而王莽時期得立於學官之古文經學，即遭今文經學諸儒極力排擠。但古文經學的力量，在王莽時期獲得莫大發展，此時古文經學之力量，再也難以輕易壓制。

東漢初年，今古文經學形成勢均力敵之勢，對立愈烈，光武曾努力制衡各派勢力，以弭平紛爭《後漢書·儒林列傳》載：

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協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

由於盡廢王莽所制，因此古文經學博士盡遭廢除，光武所立十四博士表面上皆是今文經學。但就雲集京師之經學大師來看，今文學者有三位（治梁丘《易》之范升、治施氏《易》之劉昆、治歐陽《尚書》之桓榮），古文學者有四位（治《左傳》之陳元、鄭興，治《古文尚書》之杜林，治《毛詩》之衛宏）^⑯，可見光武兼重兩派，有意以懷柔方式調解兩派利益衝突，此時古文經家雖未立於學官，但已不容統治者漠視。不久，議立《左傳》博士之聲浪又起。

^⑮ 任繼愈編《中國哲學發展史》，頁四六四～四六七。

^⑯ 見《後漢書·儒林列傳》：「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又《後漢書·杜林傳》：「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嘗師事劉歆。」

伍、繼續爭取為《左氏傳》建置學官

一、韓歆為《左氏傳》建置學官請命

基於政治因素，光武盡廢王莽所立之古文經博士。然而光武中興，政權初立，正是網羅人才、安定秩序之時期。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再次為《左氏》立學官一事請命。對於韓歆之提議，光武甚為重視，故詔羣儒議此事。

建武四年，光武親自出面，下詔公卿、大夫、博士朝見於雲臺。兩派學者各抒己見。此《後漢書·范升列傳》載之：

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

其中范升反對最力，且以《左氏》為攻擊焦點。范升認為《左氏》不可立有三：一者《左氏》源自丘明，非祖述孔子，不承認其傳《經》；再者時人重家法師承，《左氏》未得久立學官，未見其正視傳承，故不肯定其學術價值；三者在經學博士存廢之中，《左傳》並非先帝所存（哀帝時，歆請立，並未如願；直至王莽專政，始得以立），故不承認其合法地位。

范升不僅當場論說，議後又乘勝追擊，上奏《左傳》之失，見《後漢書·范升列傳》曰：

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驪、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驪、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

為防止「異端競進」、異說層出不窮，范升極力反對費氏《易》及左氏《春秋》立學官。聲稱立左氏將引起驪、夾之競立，徒增紛擾。並揣測其請立動機，是緣自妒恨今文家得位，以為立左氏《春秋》、費氏《易》實非當務之急事。

二、陳元力爭擁立《左氏傳》於學官

當時大夫陳元，嘗事賈護，並從父欽習《左氏春秋》。（《後漢書·陳元列傳》）當范升奏議「《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訊，旋即詣闕上流，獨護《左氏》，以死自誓，與升駁辯，其疏曰：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為異家之所覆冒。……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媒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扶瑕撻髡，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淘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後漢書·陳元列傳》）

古文學家陳元針對范升認為《左傳》不合孔子之言（升曾摘取《傳》文中數十條論據為證），進行辯駁，以「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陳元駁之曰：「丘明至賢，親受夫子」，而真正不祖述孔子，僅憑傳聞而流傳後世之《公》、《穀》反得立於學官，故抨升不應「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又范氏以《左氏》「師徒相傳又無其人」；陳元解釋曰：「左氏孤學少與，遂為異家之覆冒」，礙於義高和寡，故為他家所蔽而不得盛行。再者，范氏以為《左氏》「非先帝所存」，宜見棄；陳元以盤庚遷殷、周公營東都之事，以明時君宜知權變，因時制宜；況且武帝好《公羊》，則《公羊》立；宣帝好《穀梁》，則《穀梁》興，不必相因也。范升視《左氏》為異端，一再斥其不傳《春秋》；陳元則以《左氏》乃「解釋先聖之積結，淘汰學者之累惑」，故力請辨明是非，以辭合經、事稽古之《左氏》立於學官，俾滌後進狐疑。凡此，陳元認為范升僅以枝節責難，未深體《左傳》所闡之「孔氏之正道」。

此後，陳元復與范升相辯難，凡十餘次。陳元終於說服皇上，贏得肯定。「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足見光武為平衡兩派之爭執，決定立《左氏》於學官。

方太常為《左氏》選博士四人，原本陳元排名第一，光武「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此舉可見光武帝對今文諸儒仍有所顧忌。此次爭議後，陳元雖力挽狂瀾，使《左氏》再次得立於學官，但仍不時遭受今文諸儒之打擊。《後漢書·陳元列傳》曰：

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譴譴，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

光武雖獨排眾議，奮獨見之明而興立《左氏》學，然《左氏》立於學官後，仍不時遭今文諸儒一再排擠，竟隨博士李封病卒，不再補缺，旋再遭廢。此後不再立。^⑩

雖未順利立於學官，古文經學卻日益贏得上位者重視，章帝時甚至特下詔：「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後漢書·孝章帝紀》）可見《左傳》雖未能久立於學官，然風潮既成，顯然地位不容動搖。

三、盧植上疏為古文立學官請命

盧植字子幹，《後漢書·盧植列傳》云：「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於靈帝建寧中徵為博士。靈帝時，為因應博士弟子考試之用，開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熹平四年諸儒受詔刊經，時盧植上疏要求以古文刊正碑文，疏云：

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牴牾，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

植欲以古文經典刊正碑文，並希冀近實卻備受壓抑而深獲大儒所好之古文經學得立於學官；惜此番主張，並未得朝廷接受，此時靈帝寧遵守先帝所定，不願增立，而盧植一片苦心，終又付諸流水。

⑩ 此可詳《後漢書·潁容傳》曰：「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眾議，而因不復補。」

陸、終漢之世《左氏傳》不得立學官之緣由

《左氏》之議立學官，自劉歆倡之，極力爭取，雖得建立，然好景不常，及韓歆再議，陳元以死駁辯，雖贏得光武採納，但仍難保寶座；又盧植懇切上疏，仍難從願。尤其自西漢末到東漢初，在今古文家往復攻訐辯難爭戰中：劉歆與太常博士，韓歆、陳元與范升爭議重點始終是以《左傳》為中心，在於論難《左傳》與《公羊傳》優劣問題，及《左傳》與已立博士爭奪經典解釋權。

《左氏傳》一再旋立旋廢，但非真受冷落，在兩漢今古文爭戰中，卻屹然高居主角地位。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對此言之甚明：

漢今古文家相攻擊，始於《左氏》、《公羊》，而今古文家相攻若仇，亦惟《左氏》、《公羊》為甚。四家《易》之於《費氏易》，三家《尚書》之於《古文尚書》，三家《詩》之於《毛詩》，雖不並行，未聞其相攻擊，惟劉歆請立《左氏》，則博士以左丘明不傳《春秋》抵之；韓歆請立《左氏》，則范升以《左氏》不祖孔子抵之；……各經皆今古文之分，未有相攻若此之甚者。

皮氏謂「各經皆今古文之分，未有相攻若此之甚者」，《左氏傳》在今古文之爭中凜然成為議論之焦點，無形中提升地位，被置於殿堂論辯，雖在議立學官上備受攻訐，其學說卻也因此日益顯盛。

對於《左氏》議立學官一再遭挫，試綜理其原因，約可見以下數端。

一、未能暴論讖緯大義

明白指出《左傳》未能立於學官之癥結，見於東漢賈逵之言，其認為《左氏》立學官難以遂願，乃在於不知迎合時尚，暴論讖緯之大義。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父徽，嘗從劉歆受《左氏春秋》，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雖為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後漢書·賈逵列傳》）

章帝即位，雅好《古文尚書》及《左氏傳》，詔逵入講白虎觀、雲臺，由於帝善逵說，使發《左氏》大義長於二傳者，賈逵不但溯及《左氏》議立失敗緣由，也道出《左氏》所以長於二傳之大義所在。逵具條奏曰：

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祕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

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眾心，故出歆為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後漢書·賈逵列傳》）

逵強調，其先前講《左氏》與圖讖合者，備受明帝喜愛，而撰傳詁，藏諸祕書。是故逵以謂劉歆奮力爭立《左氏》，卻遭排擯，蓋在於不知「先暴論此大義」，以致遂成眾仇；光武雖興立《左氏》，然又以其「先師不曉圖讖」故中道而廢。逵認為《左氏》實有優於五經家者，以其獨有明文證圖讖以知劉氏為堯後者。歸結《左氏》不穩立於學官，賈逵認為其關鍵在於其先師不知附會圖讖所致。

賈逵此書奏上，甚得章帝歡心，因逵能附會讖言，頗投帝王所好，而逵之特別明言《左氏》合讖，無非是為現實考量，因逵深知若不如此，古文恐無翻身餘地，難以得上位者青睞。此時章帝特「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左氏》雖未因此而立於學官，然而卻再度受到重視，引起時人欣羨不已。此見於《後漢書·賈逵列傳》：

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

《左氏》雖未取得博士正式出身，但章帝對於古文學家特加禮遇下，已逐漸獲得實質承認，此代表政治上對古文態度之轉變。

然而，對《左氏》合圖讖之說，時人李育頗不以為然。《後漢書·儒林列傳下》曰：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為同郡班固所重。……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

李育以陳元、范升等「多引圖讖，不據理體」，刻意附會圖讖，枉顧理體之作法，實令人難以服義。是故，建初四年，帝詔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李育「以《公羊》義難賈逵」，而且「往返皆有理證」，令人折服。因此史家嘗譏逵以附會圖讖得以顯貴。《後漢書·賈逵列傳》論曰：

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亦徒有以焉爾。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

史家譏賈逵行權，一意迎合君主所好，而致貴顯，亦感嘆漢主實不應以圖讖論學。

蓋漢世讖緯^⑮之學興盛，從武帝採董仲舒之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自董氏《春秋繁露》喜言災異，好以天變驗人事，而經學既是利祿之途，故儒術逐漸染災異陰陽之說。《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曰：

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

於是以符命、災異思想釋經義，又為君權提供絕對之依據；假災異以預言諫諍時政。迨西漢末年政治危岌，讖緯神學更是深入人心，氾濫成為社會思潮，有心夤緣取利之士競相夸說附會，如《漢書·哀帝紀》載：「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應劭注曰：「高祖感赤龍而生，自謂赤帝之精，良等因是作此讖文。」），漢家曆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哀帝果信之，以建平二年更為太初元將元年，易號為陳聖劉太平皇帝。此時深受帝王肯定之今文經學為適應社會需求，亦不得不以陰陽讖緯之說附會五經。

王莽奪取政權過程，因缺乏思想支柱，便充分藉讖緯及今文經學推波助瀾，促使當時讖緯之風盛行不已。《漢書·王莽傳》王莽大誥云：「太皇太后臨政，有龜龍麟鳳之應，五德嘉符相因而備，河圖洛書遠自崑崙出於重嶺，古讖著言，肆今享實。」圖讖以能占驗人事，預決禍福吉凶，每一變便驗一事，王莽對讖語深信不疑。而後王莽更企圖憑藉讖文指漢祚已終，自詡乃天命為王之真命天子，始建國元年王莽詔云：「深惟漢氏三七之厄，赤德氣盡，思索廣求，所以輔劉延期之跡，靡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幾以濟之。然自孔子作《春秋》以為後王法，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畢；協之於今，亦哀之十四也，赤世計盡，終不可強濟，皇天明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

⑮ 《史記·趙世家》：「秦讖于是出矣。」可見這種預言隱語早已有之。所謂讖，《說文解字》曰：「讖，驗也。有徵驗之書，河洛所出書曰讖。」緯，則是相對於「經」而言，以迷信神異解釋儒家經典之經義。緯出現較讖為晚。《四庫全書總目·易類六》曾述及緯書之源流：「緯者經之支流，衍及旁義。……蓋秦漢以來，去經日遠，儒者推闡論說，各自成書，與經原相比附。如伏生《尚書大傳》、董仲舒《春秋陰陽》，核其文體，即是緯書。特以顯有主名，故不能托諸孔子。其他私相撰述，漸染以術數之言，既不知作者為誰，因附會以神其說。迨彌傳彌失，又蓋以妖妄之詞，遂與讖合而為一。」原本讖緯並非一類，今人陳槃於〈讖緯書命名及其相關之諸問題〉文中則云：「今按讖、緯、圖、候、符、錄，雖稱謂不同，其實止是讖緯，而緯復出於讖，故讖、緯、圖、候、符、書、錄七名者，其於漢人通稱互文不嫌也。蓋從其古驗言之，則曰讖；從其附經言之，則曰緯；從河圖及諸書之有文有圖言之，則曰圖。」由於緯書藉由預言，得以自我神化；讖依附經義，更能收宣傳之效；於是緯中有讖，讖中有緯，二者完全合流，發展為一種社會思潮。

尤其光武起事，此風愈烈。《後漢書·光武帝紀上》云：「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終應符讖而為天子，故光武尤信讖緯，《後漢書·方術列傳》曰：

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騁馳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

光武時讖緯發展盛極一時，經學家為迎合上位者喜好，企圖以緯讖和五經相互比附，以為政權服務，今文圖讖自是備受榮寵；而如桓譚、尹敏等古文家一致反讖，也須為反讖之不能同乎潮流付出代價。而終漢之世，圖讖之勢未嘗或衰。《後漢書·張衡列傳》曰：

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詬言。

在讖緯風熾，不可遏抑之潮流下，說經雜讖緯占驗，乃時勢致然。《後漢書·樊儵列傳》載儵「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以讖記正五經異說」。可見賈逵明白標舉《左氏》最合圖讖者，便不足為奇；又可見之前《左氏學》不願附會圖讖，故在讖緯盛行之當時無以致顯。然而以經學附會圖讖，妖言惑眾，偽亂經學之行，實非《左氏》之所長。

二、未能迎合上位者政治需求

迎合上位者之政治需求，有時是得以立官顯盛之重要因素。初，劉歆為古文經學立官事奔走，徒勞無功。由於今文門閥勢力強大，在當時一無常官、二無門徒之古文派，難以取得平等抗爭之地位。迨王莽既得政權後，為復古改制，需古文經學作依據，《左傳》及其他古文諸經，始得以挺入學官之列。故平帝時古文雖曾立於學官，但平帝時王莽專政繼而篡位，故平帝及王莽時所定制度，皆不為東漢諸帝所尊重。因此王莽挫敗對古文發展，無異是一重大打擊，頓時集體利益、政治理想皆化為泡影。

可見被立於學官，不但享有學術優勢，更具政治權勢。同門攀附以進，便可形成一股可觀之政治勢力。而能否立於學官，取決於該學說是否合於政治需要，或是得到帝王垂青。

從西漢末到東漢末，今古文之爭長達二百多年，漢代帝王面對今古文之相持不下，往往採取「扶持微學」、「網羅遺逸」、「博存眾家」的態度，但難免因應政治不同需求，在今古兩派作選擇。例如：今文派《公羊春秋學》以「孔子為漢制法」，迎合漢代政治需要，所以久居官學地位；而古文《左氏春秋學》以「漢為堯後」之說，引伸為「禪讓」觀念，又正適合王莽企求政權合法之需求，使得《左氏》之學一度備受王莽重視，

立於學官。

再者，今文經學旨在闡發六經之微言大義，重視《公羊春秋》學，故易與緯書相結合，沾染濃厚之神學色彩；古文經究史實，述古制，表現樸實學風，故《左氏》堅守質實，不擅延伸附會，自是較難迎合在位者力擢。

三、古文晚出備受排擠

然而《左氏》立學官之乍起乍落，其間癥結，除迎合讖緯風尚及上位鞏固政權之需外，縱觀漢代經學發展，《左氏》晚出，亦是造成難以遂立之因素。

漢人傳經，講究家法師承，門戶之見深，水火不相容；當劉歆請立《古文春秋左氏傳》，必是黨同伐異，極力反對。經學博士之建置，光武帝立十四家經學博士皆為今文經學，在後漢強調家法，說經各以家法傳授，必恪守一家之學，否則將遭上位者禁戒（如張玄治《公羊》顏氏學，會顏氏經學博士缺，玄以試策第一，被拜為經學博士，後因人告發其兼說嚴氏、冥氏，光武帝令其還署）。由於今文經學之貴守家法，博士弟子為利祿不得不拘守師說；又博士專己守殘，不肯讀古文經，《漢書·藝文志》：「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正是今文經師之寫照。如此今文博士只知拘泥《公》、《穀》，認為只有《公》、《穀》才是《春秋》之傳。

《左氏傳》解經，乃敷陳史實，傳《春秋》本事，不若《公》、《穀》之口說義法，因此在《左氏傳》實而有徵之情況下，《公》、《穀》誤說無以遁形，故諸儒極力斥之，堅持以《左氏傳》不傳《春秋》，反對立學官；或有見於《左氏傳》之體裁，與《公》、《穀》不同^⑨，不承認其解經功能，而一意排擠。

初，劉歆之爭立《左傳》，主張古本較全而近古。博士則以今文無缺漏，《左氏》不傳經相抗。原本劉歆並非企圖取代已建立之博士，蓋僅圖利益均霑，豈料在激烈爭辯下，博士便羣起合力封阻古文經，迫使哀帝在兩者之間作抉擇。

今文經學傳自西漢之初，古文經學則較晚出。今文經學於武帝時便得立於學官，古文經則遲至王莽時始得立於學官。因此既得利益者，為護衛其權位，無不積極反擊角逐。因此《左傳》一再遭詆毀實由於涉及利害之爭，非僅在於今、古文學說經義之歧異。《公》、《穀》今文經博士立官已久，古文《春秋左氏傳》欲並立，古文既是晚出，勢力大小有別，又乏師弟相承，勢必難抵排擠。

置博士、立學官，無異形成官學護衛既得利益之堡壘，因此益形重視師法家法之傳承，不容留予他人可乘之機。為嚴守一家之學，經學博士之建置，自東漢光武帝立十四

^⑨ 一如杜預《春秋序》所說：《左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有時有經無傳，有時有傳無經；不若《公》、《穀》之論說義法，傳《春秋》口說。

經學博士後，便不再新設經學博士，而且各家經學博士只能一人擔任，一反西漢一經可有數位博士擔任^②。《左氏》既是晚出，無形中喪失掌握先機，勢必難敵今文博士。

四、學官經學繁瑣日漸衰頹

漢代經學發展，從武帝開始，經過百餘年之發展，經學傳承日益繁瑣，由於經說紛紜，「一經說至百餘萬言」，不得不刪減章句，（《後漢書》中多有刪減章句之記載）；再者，一經分立數家，一家又衍支派，「大師眾至千餘人」，由於競爭激烈，嫌隙日大，同一經中各家之學爭正宗，或是不同經之間爭優劣，除學術上爭權外，也為利祿謀取相持不下。

博士說經，蓋以其所專精之經書教授弟子。凡經書大多先秦文獻，透過經師注解、傳、說、故、章句之闡釋，始能為人了解。其中解釋章句文義、史實及天文歷算、名物制度者，是名物訓詁純學術性釋解經典；而發揮、闡明五經中微言大義者，則極力履行統治思想，與漢代封建政治相聯繫。於是經學傳授訓釋，凡是自成一家之言者，經師為干祿求榮，無不紛立異說，引伸發揮，以致於後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為長保其位，迎合政治，當上位者好陰陽災異，博士及其弟子便以經說附會陰陽災異；上位者好圖讖，經書隨而染上圖讖色彩。因此，經師釋經非僅是字句訓詁或文義闡釋，更假借經文之隻言片語延伸新理論。^③

王莽一度主張減省章句。王充《論衡·效力》載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為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竟然過勞而死。可見減省之前，經師經生無不極盡牽強附會之能事。

《後漢書·儒林列傳下》：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輦輶。」

基於利之所在，光武時代儒者學說更是編牒煩碎，競論浮麗，此現象之發展可說是今文學江河日下。

由於異說競進，眾論紛紜，自宣帝時召開學術性的石渠閣會議，稱制臨決；章帝時依楊終建議於白虎觀會議，論定五經異同（《後漢書·楊終列傳》）；安、靈帝時訂五

^② 林慶彰《經學研究論叢》（二），〈漢師家法〉，頁九二。

^③ 林慶彰《中國經學史論文選集》，〈兩漢章句之學重探〉，頁二八三～二八四。

經文字，無非皆由皇帝親自出面，在皇帝支持裁決下，促使各家之學得到調和^②。

《後漢書·儒林列傳上》言及：

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論。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弟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眾家。

經生為鞏固自家之學，解經時好牽引佐資，不斷發揮理論，力圖迎合朝廷，以致日說日遠。《後漢書·鄭玄列傳》：「論曰：『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愈鑽愈窘，即使會議再多，也難以挽救其危亡。而章句之學沒落，正助長古文訓詁之學興盛，當時追求博通，志氣高遠之學者（如揚雄、班固、王充等）再也不屑習今文。代之而起者，為承繼漢初傳統治經之古學，講求博通之古學家以開擴之局取得學術之主導地位。

此外，由於重視師法家法，因此日益形成自我封閉之窘況，嚴重局限今文經學之發展。反觀東漢古文經學，未立於學官，不受家法之束縛，因得以自由發展。經過多次爭論，皈依古文經者日多，帝王也漸傾古文，以致逐日取代今文經學地位，造成東漢末年古文經學大盛。此時《左氏》毋須立於學官，自能顯發。

五、官學沒落私學興盛

立於學官之經學，是統治者以政治力量扶植，基本職能在為王權服務。故其發展不在於符合儒家經典原義，而在於是否與王權緊密配合，使統治者之統治思想能有效運轉。東漢後期，由於接連外戚、宦官、黨錮之禍，使得王朝統治發生嚴重危機，與王權相輔相成之經學沒落，成為必然趨勢。對於東漢學官經學由盛而衰之發展過程，《後漢書·儒林列傳上》載之頗明，尤和帝以後，已明顯可見衰頹現象：

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于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積敝，鞠為園蔬，牧兒薨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

雖統治者曾企圖挽救，又因其本身「浮華相尚」，陷入繁瑣支離之窘境，已無法扭轉其頹勢。

② 同註②。

反之，一般流傳於民間之學術性經學，其職能在於為儒家經典作訓詁和發義理，經過幾百年之積累進步，逐漸擺脫師法、家法專治一經之傳統學風，博採眾說，兼容並蓄，醞釀學術融合之局，於是出現許慎、馬融、何休、鄭玄等集大成之經學大師。

昔日，經師受朝廷任用，是無上榮耀，因此官學占絕對優勢，私學難以彰顯，經學發展以立為官學作為積極奮鬥之目標。然而東漢末年情況全然改觀，由於政治腐敗，學者為避免受迫害，紛紛轉從學術性經學研究。如《後漢書·儒林列傳》所載：任安「少游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楊倫「為郡文學掾。更歷數將，志乖於時，以不能人閒事，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景鸞「州郡辟命不就」等等。皆不再以經學作為干祿求進之手段，而是隱居教學，避門著述。古文學家毋須朝廷支持，即可大量授徒，私學之吸引力遠勝官學，此時學術研習勝於經世致用。

六、今古文經學之融合

東漢學者對於今文學家陰陽災異、非傳統儒家正統之說日感厭棄，故崇古文輕今文，大師如賈逵、許慎、馬融、服虔等即是。

《後漢書·賈逵列傳》：「逵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學，《爾雅》訓詁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由於賈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受到學者推崇，「後世稱為通儒」。所謂「通儒」，即是兼通古今文學；因其溝通《尚書》、《詩》之今古文說。又建初元年，逵於條奏中評《左傳》深明「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綱紀」，並指出「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可見亦通《左傳》和《公羊》。賈逵可說是首先打破今古文文學壁壘分明之局。

《左氏》學雖未得興立於學官，然其流布傳授，屹然居於傳說《春秋》之地位，得以與《公》、《穀》並舉；此可從桓、靈之際，鄭玄、何休之論辯中見其受肯定，成為三傳之一。《後漢書·鄭玄傳》曰：

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瓛，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何休執《公羊》以攻二傳，難免失之偏頗；鄭玄則意在宏通，兼從今古文家之說，折衷

去取，故何休不得不折服道：「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由於鄭玄之學在靈、獻帝時為時人所重，故「弟子自遠方至者數千」，是鄭玄之重古文，更使得古文經學盛行當時。

柒、結論

秦之焚書，對於羣經延續打擊極大，因經籍殘存演成今古文之論辯、派別之鬥爭，也因此將經學帶領到全盛時期。

縱觀《左氏》在兩漢時代之發展：劉歆倡之在先，雖突破艱難，得以在王莽當政時立於學官，怎奈政權替代，無疾而終，慘遭廢除；中興之後，范升、陳元之辯，《左氏學》以險勝之姿，異軍突起立於學官，卻又曇花一現；及至賈逵、李育之辯，儼然附會圖讖，令人刮目，由此致顯；最後，何林、鄭玄爭論今古，終以鄭玄之兼容並包，平息紛爭。在這曲折多磨之坎坷道上、往返辯難之反覆過程中，促使對《左傳》之認識愈益深刻。久居於官學地位之今文派經學固然勢力強大，由藏諸祕府，掘發而成顯學。此正同錢穆於《國學概論》中所道：

當劉歆校祕書，初見古文《左氏》，則《左氏》之傳習猶未盛也。故歆請立官而諸博士或不肯置對，猥以不誦絕之，是當時諸博士多未見古文《左氏》也。東漢時，范升、陳元之爭，范升奏《左氏之失十四事》，又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李育、賈逵之爭，育《難左氏義四十一事》。何休墨守《公羊》，而亦兼治二傳，故著書論其得失。是當時雖阻抑《左氏》立官者，亦未嘗不誦習其書，則書籍之流布傳授，已不如西漢之艱難，故學者得以博綜兼覽，實不必賴於立官之博士，此則當時一大進步也。

是古文《春秋左氏傳》，與今文諸儒不斷抗衡纏鬥中，愈挫愈奮，遂得以執三傳之牛耳。就三傳傳《經》而言，《左氏》與《經》如東漢桓譚所說：「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桓譚《新論》）否則被王安石譏為「斷爛朝報」之《春秋》，若乏《左氏》為之傳，則無以通明，故三傳之中，《左氏》重於《公》、《穀》。雖終漢之世《左傳》未能立於學官，逮至曹魏則《左傳》等古文經皆得以順遂立於學官。可見《左氏》學之日顯，除外在環境影響，亦深受其內在實質所主導。

（本文作者現任朝陽科技大學共同科講師）

參考書目

1. 《左傳》 《十三經注疏》 臺北：藝文印書館 民國七十八年一月 十一版
2. 《公羊傳》 《十三經注疏》 臺北：藝文印書館 民國七十八年一月 十一版
3. 《穀梁傳》 《十三經注疏》 臺北：藝文印書館 民國七十八年一月 十一版
4. 《史記會注考證》 (日) 瀧川龜太郎注 臺北：洪氏出版社 民國六十六年五月五版
5. 《漢書》 (漢) 班固撰 臺北：宏業書局 民國八十一年四月 再版
6. 《後漢書》 (宋) 范曄撰 臺北：宏業書局 民國七十三年三月 再版
7. 《增補六臣注文選》 (梁) 蕭統編 臺北：漢京出版社 民國六十九年二月 初版
8. 《經典釋文》 (唐) 陸德明撰 臺北：漢京出版社 民國六十九年二月 初版
9. 《段注說文解字》 (漢) 許慎撰 臺北：廣文書局 民國六十七年十月 三版
10. 《史通》 (唐) 劉知幾撰 《四部叢刊》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1. 《釋名》 (漢) 劉熙撰 《叢書集成簡編》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2. 《新論》 (漢) 桓譚撰 《百部叢書集成》 臺北：藝文印書館
13. 《春秋繁露》 (清) 董仲舒撰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4. 《左氏春秋考證》 (清) 劉逢祿撰 《皇清經解》 臺北：藝文印書館
15. 《史記探原》 (清) 崔適撰 臺北：廣文書局 民國七十一年三月 初版
16. 《劉申叔先生遺書》 劉師培撰 臺北：華世出版社 民國六十四年四月
17. 《國學概論》 錢穆撰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民國七十五年五月
18. 《讀經示要》 熊十力撰 臺北：洪氏出版社 民國七十一年十月 初版
19. 《春秋史論集》 張以仁撰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民國七十九年元月 初版
20. 《新學偽經考》 康有為撰 臺北：世界書局 民國七十九年元月
21. 《古籍辨偽學》 鄭良樹撰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民國七十年 初版
22. 《偽書通考》 張心澂撰 臺北：明倫出版社 民國六十年 二版
23. 《經學通論》 皮錫瑞撰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民國七十八年十月 五版
24. 《春秋左傳讀》、《春秋左傳讀敍錄》、《駁箴膏肓評》 章太炎撰 臺北：學海出版社 民國七十三年四月 初版
25. 《古史辨》 顧頡剛等編 臺北：明倫出版社 民國五十九年三月
26. 《經學淺談》 楊伯峻撰 《國文天地》 民國七十三年七月 一版
27. 《中國經學史》 馬宗霍撰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民國七十五年二月 七版
28. 《中國學術思想大綱》 林尹撰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民國七十年十月 二版

- 29.《中國學術思想史》 林啟彥編著 臺北：書林出版社 民國八十三年 初版
- 30.《兩漢思想史》 徐復觀撰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民國七十八年二月 三版
- 31.《中國經學史的基礎》 徐復觀撰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民國七十九年七月 初版
- 32.《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錢穆撰 臺北：東大出版社 民國七十八年十一月 三版
- 33.《羣經述要》 高明編 臺北：黎明書局 民國六十八年十月 初版
- 34.《經學研究論集》 王靜芝等撰 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民國七十六年元月 初版
- 35.《春秋三傳研究論集》 戴君仁等著 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民國七十八年二月 三版
- 36.《春秋要領》 程發軔撰 臺北：東大出版社 民國七十八年四月 初版
- 37.《左傳通論》 方孝岳撰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民國六十八年十月 初版
- 38.《秦漢思想研究》 黃師錦鉉撰 臺北：學海出版社 民國六十八年一月 初版
- 39.《經學研究論叢》 林慶彰主編 臺北：聖環圖書公司 民國八十三年十月 初版
- 40.《中國經學史論文選集》 林慶彰編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民國八十一年十月
- 41.《東漢時代之春秋左氏學》 程南洲撰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民國六十七年六月
- 42.《西漢之儒學》 張慧芳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七十一年五月
- 43.《東漢經術與士風》 翁麗雪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七十二年四月
- 44.《從災異到玄學》 謝大寧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民國七十八年五月
- 45.〈經今古文學問題新論〉 黃彰健撰 《大陸雜誌》第五十八卷第二期至第六十四卷第一期 民國六十八年二月至民國七十一年一月
- 46.〈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有關今古文經之探討〉 朱廷獻撰 《孔孟學報》第五十二期 民國七十五年九月
- 47.〈博士官與今文經學〉 杜松柏撰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十九卷第二期 民國七十五年二月
- 48.〈論古讖緯圖候符書錄之稱謂〉 陳槃撰 《學術季刊》第三卷第三期 民國四十年九月
- 49.〈讖緯書命名及其相關之諸問題〉 陳槃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廿一本 民國四十年四月